

收入不平等往何处去

约莫·科瓦米·桑达拉姆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

趋同？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在公元1500年前，所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大致相同(以1990年的价格水平估算，约为500美元)。到了190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提高到6:1(Maddison 2010)。2000年，这一比例仍基本维持在同样水平。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撒哈拉以南非洲、东欧、苏联和拉丁美洲不但没有缩小，甚至还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设法弥合了这种差距，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中国和印度也成功地缩小了与更为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图1)。

如果说趋同和趋异都是副现象，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何为深层次的现象？在当今时代，消费已经不再与生产直接相关，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有些国家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投资超过储蓄，进口超过出口，消费超过产出，并最终负债累累。然而，从长期来看，最终决定生产能力和绩效成就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投资差额比率。利用回归分析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计量学认识到，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预测长期增长率最有效的指标。例如，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赶上西方国家，就是因为它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高。在当前危机之前的十年间，希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投资与生产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希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0年为西欧(29个国家)平均水平的42%，增加到2006年的74%(Maddison 2010)。在危机之前至少十

年的时间里，希腊工人的生产率与工资水平并没有阻遏私人投资者进行投资。当然，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工资报酬的增加，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不会发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驱散当前所流行的都市市井传说：希腊陷入停滞的元凶是懒惰但却

约莫·科瓦米·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马来西亚经济学家，马来西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院 Tun Hussein Onn 国际研究主席，2005—2015年任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助理秘书长，2007年因推动经济学前沿取得进展获“瓦西里·列昂惕夫奖”。Email: jomoks@yahoo.com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博士，曾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和数学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2009—2015年任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高级经济事务官和地区间事务顾问，2017年起任设在柏林的文明研究对话研究院(DOC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主管。近著有《混合的命运：中国、俄罗斯和西方的经济史》(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等。Email: popovv54@hotmail.com

好斗的工人。

增长的原因与可持续性,以及相关的资源和人口的潜力和制约因素等,也是很重要的。有大量历史证据表明,国民的直接投资来源非常重要。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通过动员国内资源而进行的投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通常考虑的是中期的投资收益率。与私人投资相比,公共投资更有可能会以国家为导向。所有这些因素决定并维持着积累过程,并因此可能导致产出的持续增加。

影响增长可持续性的因素还包括其是否依赖于开采可耗尽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尽管“资源诅咒”的论点最近颇为流行,但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当多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大大得益于此类资源的开采。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些国家(如西亚地区的油气生产国)已经因商品价格上涨而大幅增加了收入,尽管产出并没有强劲增长。不过,这种收入增长将

很难维持下去。最近颇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框架,主张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可以设想的形式资本,如“金融资本”,这也存在问题并具有误导性。不同的人口转型所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期间,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同时后殖民国家因采取更加有利于发展的政策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20 世纪 70 年代则是复杂的 10 年,自那之后,拉丁美洲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即使没有停滞,也陷入了增长缓慢的境地。日本经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几乎就没有怎么增长,东南亚国家在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则一直起伏。因此,目前还不清楚东亚最近的增长是否能在整个地区保持下去。要让收入趋同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持续且快速的的增长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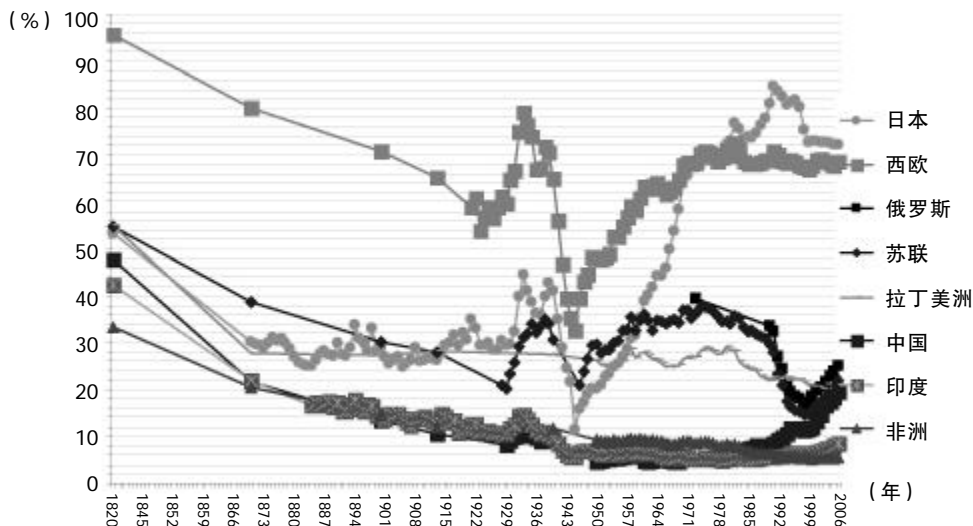


图 1 各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 1990 年的国际吉里 - 哈米斯元计算,占美国的比例)

资料来源: 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OECD, Paris.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ndex.htm>.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对生活水平产生影响。各类证据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可增加生产者的收入。但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经常会降低商品价格，而非提高生产者的净收入，尤其是在扣除额外投入及其他为确保生产力提高而付出的成本之后。

正如汉斯·辛格(Hans Singer)和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上半叶，初级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同样，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指出，在同一时期内，热带农业产品的价格相较于温带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最近以来，与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相比，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也有所下降。

一些重要的矿产品如石油的价格在20世纪确实在上涨，而且现在正处于很高的水平。资源富足可能因此而成为幸事，而非诅咒。西亚是南方国家(继东亚之后)在收入或许还有福利方面正在追赶西方国家的第二个次区域，但该地区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经济模式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与东亚地区不同，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多少。毋宁说，它们的贸易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在石油租金不仅被用于消费而且被用于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较高的自然资源价格可能会有助于追赶型发展。

资源租金有很多种，从这些资源租金中获得的收入可以用于各种用途——用于不同类型的消费或投资，在当前使用或留待以后使用。如何使用由利润或租金带来的经济剩余，将决定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比如，挪威和荷兰颇具创新性地将石油收入用于扩大经济的多样性和增强其他领域的生产能力。在另一些国家，生活水平因

此而得以改善，一些人类发展指标也大幅提升。战乱前的利比亚曾凭借石油租金而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的得分高居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首位。

我们可以将战乱前的利比亚与其他大多数石油生产国进行对比。石油租金是否被成功地用于发展的目的，通常取决于它们是否很好地被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用来提高福利和增加消费，取决于用在少数人还是用在多数人身上。然而，要想在没有石油租金的情况下保持新的经济实力与能力，则几乎没有可能。一个国家的石油公司可能得到了良好的管理，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保证该国的石油财富将会被很好地用于投资或配置到发展领域，或被用于提高生活水平。

一般来说，增长更多的是来自哪里呢？增长通常主要来自于投资，而投资则来自于经济剩余，当然还有创新。主流经济学通常会假设存在着完全竞争，其中许多小生产者生产被许多不同的消费者消费的同类产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只是例外，而非普遍法则。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剩余不仅包括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利润，还包括与垄断、独占或所谓不完全竞争相关的租金——在此是指资源租金。

社会主义与趋同

瓦西里·列昂惕夫(Leontieff 1974)曾指出，一个存在利润动机但却没有计划的经济体，就像一艘有帆但却没有舵的船。它或许会迅速移动，但无法掌控，很快便会遇到问题。一个只有计划但却清除了利润动机的经济体则像一艘有舵却没有帆的船。它可能得到很好的掌控，但却可能无法快速发展。要想在快速前进的同时避开危险的陷阱，一个经济体既需要有物质刺激，如利

润动机,也需要计划,也就是说,既需要帆也需要舵。

人们对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对于政治右翼而言,几乎所有与公共部门或国家干预有关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根据这一定义,新加坡、以色列及一些石油福利国家由于在经济中存在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可被视为世界上最具社会主义属性的国家,即便它们当中有些国家在近几十年来进行了适度的私有化也是如此。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政府干预是将一个经济体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关键要素。简单地说,管控和(或)政府干预的程度越高,这个经济体就越倾向于社会主义。按照这一美国式标准,大多数欧洲国家将因政府无孔不入的存在而被视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属性。

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另外一项标准——在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用于考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 0.25—0.3 之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在“共产主义”国家以外,只有通常被称为“社会主

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才可以看到如此低的基尼指数。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例如,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他赞成的那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前瞻计划仍有意义。

苏联解体并非是由经济所决定的。相反,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的崩溃并非在苏联政治垮台之前,而是发生在此之后。在 20 多年之后,俄罗斯经济才最终恢复到 1989 年的产出水平(Popov 2010)。然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事件真正的顺序,并且错误地认为是鲍里斯·叶利钦将俄罗斯从他的前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或那些试图赶叶利钦下台的人所导致的经济崩溃当中拯救了出来。

苏联的经济发展因许多方面的原因而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它的大多数进步都是在面临严重敌对的背景下取得的。苏联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开始进行了赶超式发展。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已经逐步拉近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尽管其经济模式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且已经无法再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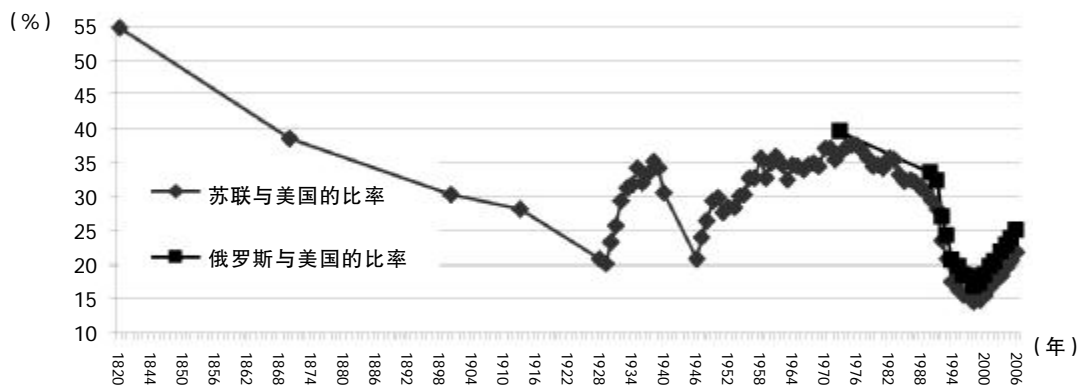


图 2 苏联(1989 年后为独联体)和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的比例)

资料来源: 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l GDP, 1-2008, AD. OECD, Paris.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续赶超西方。在苏联时期之前,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无论彼得一世在 18 世纪初的改革,还是在 1861 年(通过《解放法令》)废除农奴制度,甚或 20 世纪初的维特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都未能改变这一趋势(图 2)。

中央计划经济如今仍然存在,但很少是在国家层面。从定义来看,一个大型企业应该具有变化性和多样性,但国家从总体上针对企业制订了不变的中央计划。当问题出现并对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后,应尽快采取行动以应对错误和不足。尽管中央计划的国民经济并非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但人们通常认为它们在做出改变和纠正错误方面反应迟缓。对于为何会出现这个问题,人们看法不一,但这肯定会使那些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中央计划

的人感到踌躇。

各国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社会服务供给呈普遍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许多所谓的福利国家,在一些靠税收支撑社会服务的后殖民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俄罗斯和另外一些“转型经济体”也出现这种社会服务供给的下降。结果,个人和家庭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与收入所能负担的水平。同样,收入不平等近期以来在大多数国家——尽管并非在所有国家——都呈扩大之势。在这个经济自由化的时代,不仅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在不断扩大(图 3),而且世界范围内收入和财富的集中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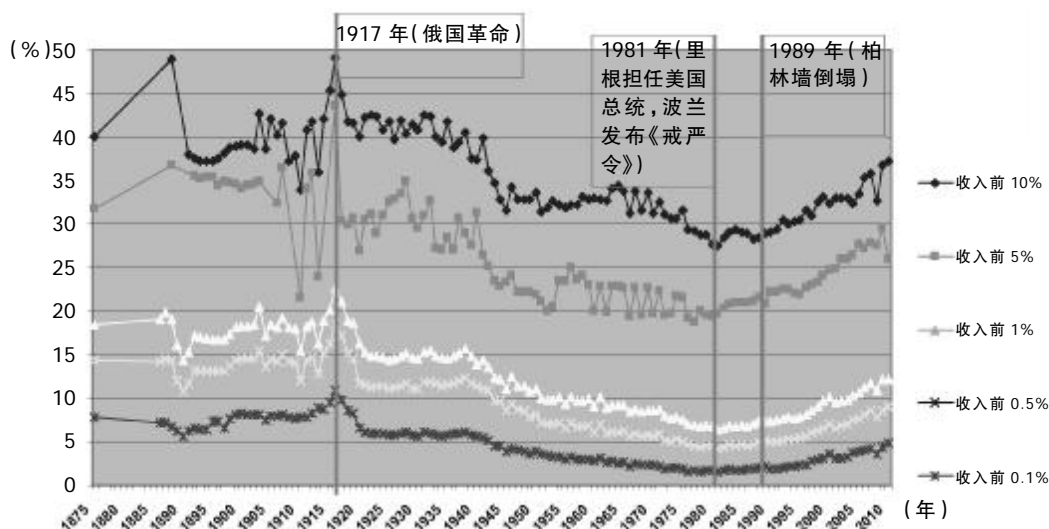


图 3 收入前 10%、5%、1%、0.5% 和 0.1% 的人的收入比例, 22 国未加权平均值

注: 欧洲国家: 丹麦、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英国、爱尔兰、挪威、瑞典、芬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北美: 美国和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拉丁美洲: 阿根廷; 亚洲: 日本、印度、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非、毛里求斯、坦桑尼亚。整体: 约占世界 50% 的人口。

资料来源: Alvaredo, Facun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2).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25 April. <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加大尤为显著。占人口 5% 或 10% 的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在过去 30 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在许多国家，不平等已经又接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而当时正是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崛起和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的急剧下降。以美国为例，前 10%（最富裕）的群体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 40%—45%，下降到 20 世纪 40—70 年代的 30%—35%，然后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增加，并在 2005 年达到 45%。

与近年来不平等加大相伴随的是利润率的不断提高。在战后的“黄金年代”，典型的情况是，当利润率高的时候，资本成功地被拿来与其他社会集团分享。以 20 世纪 50、60 年代为例，随着边际利润率（profit margins）的上升，工资、薪酬、福利等也随之一同上涨。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与边际利润率增加相伴随的却是不平

等的加大。

如果生产者主要是挣工资者，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如何确定和工资合约的性质。阿瑟·刘易斯注意到了劳动力市场的两种类型。在失业率高和收入低的地方，工人愿意接受接近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但是，在劳动力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议价谈判、劳动条件受到监管的地方，工资更有可能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例如，有几十年时间，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生产率的提高那样快，但在最近这些年，随着雇主经历劳动力短缺、指望工人有更高的技能和生产率，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随着更大程度的社会保护和更多社会服务（公共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的提供，“社会工资”的增长可能会比职工得到的金钱或实际工资显示的工资增长多得多。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工资”的增长并没有利润增长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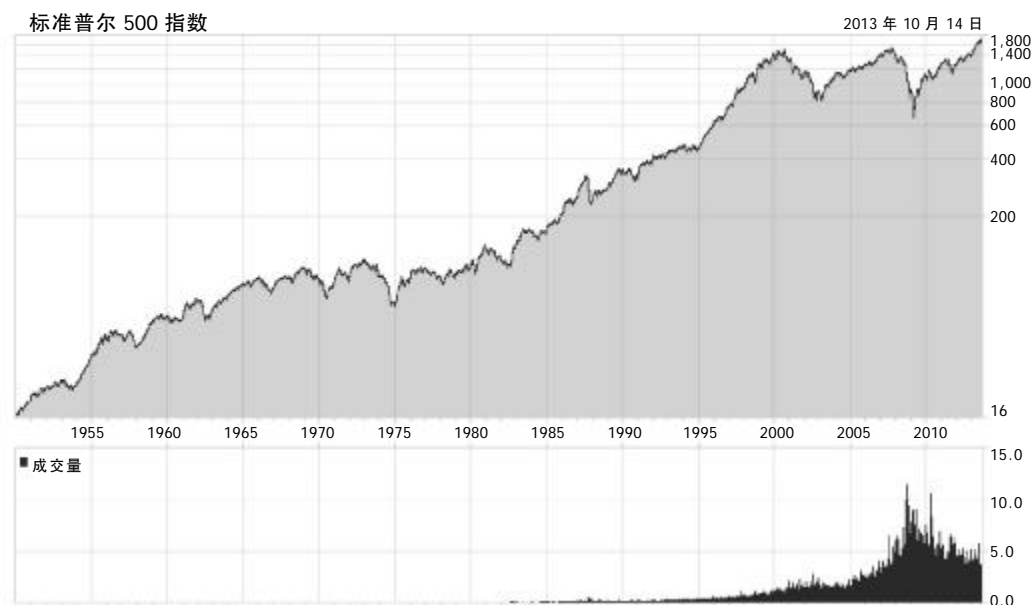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标准普尔股票价格指数，对数标尺

资料来源：雅虎财经（Yahoo finance）。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相比，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从长期来看似乎并非一个转折点 (Eichengreen and O'Rourke, 2009)。从股票指

数崩溃方面看，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 1972 年 10 月至 1974 年 7 月间，以及在 2000 年 1 月至 2002 年 7 月间，标准普尔指数都曾经几乎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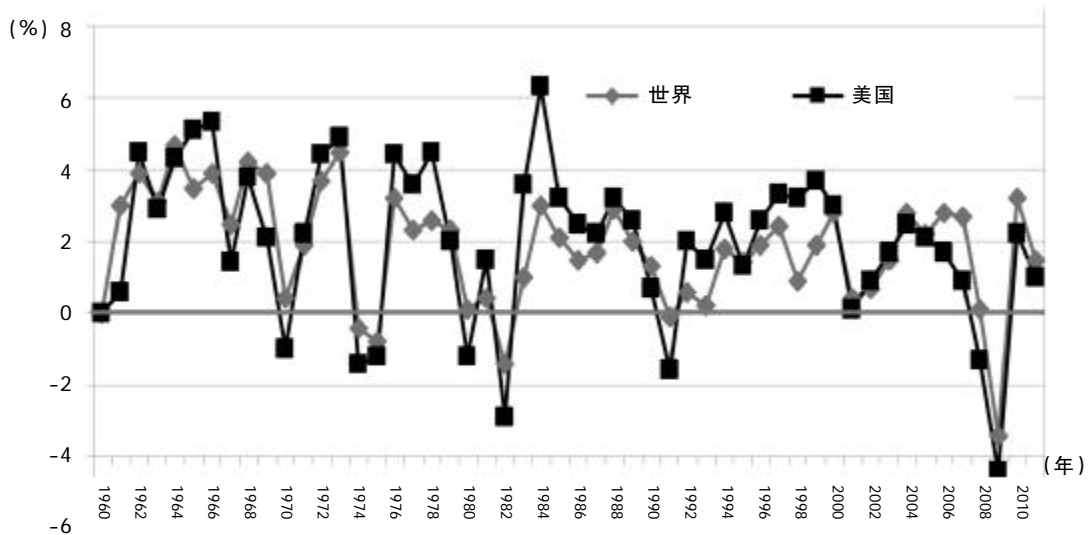


图 5 世界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60—201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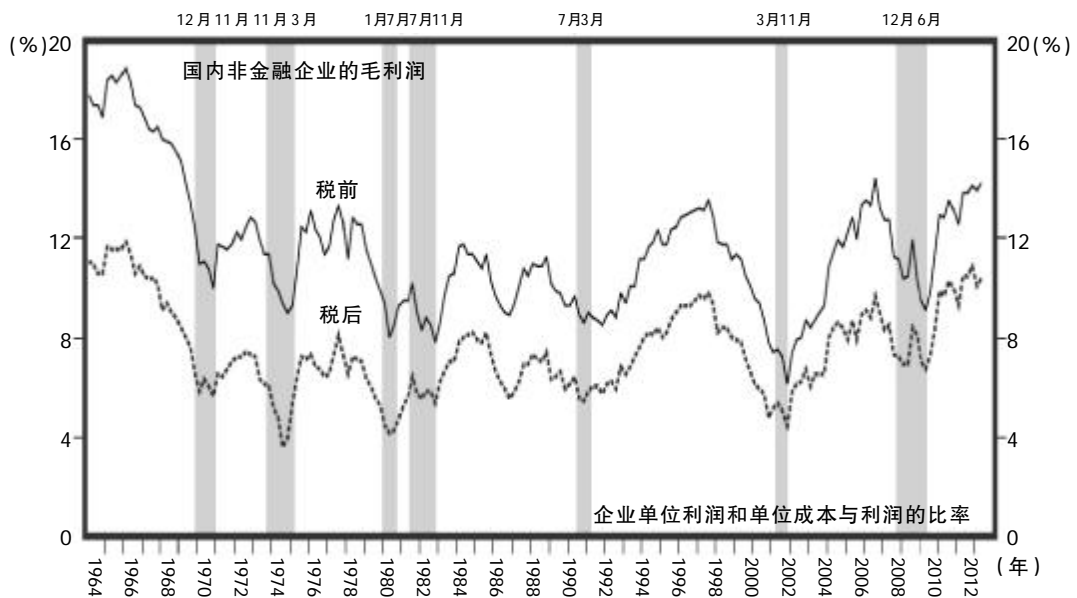


图 6 美国国内非金融企业边际利润率(利润占销售额比重)(1960—2012)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事务局 (Bureau of Economic Affairs)。

50%，与2007年10月至2009年3月下降的水平大致相当(图4)。但是，世界产出的急剧下降幅度是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2009年下降了3.4%)，比1982年下降1.4%、1974年下降0.4%、1975年下降0.8%的幅度都大得多(图5)。美国的边际利润率和利润率在1974年、1980年和2002年均下降到二战后的最低水平(图6)。美国的失业率在1982年达到二战后最高的9.7%，与之相比2009年则为9.6%(图7)。与此同时，美国的实际工资也低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但利润仍然很高。¹

经过1973—1974年和1978—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震荡，主要西方国家均出现了严重甚至达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下滑。两种情况意想不到地同时出现，使这一时期被冠上了“滞胀”的标签，而且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似乎对其

不起作用。第一次石油价格震荡紧随1973年的阿以战争而至，第二次震荡期间则爆发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1974年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随即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崩溃，美国军队在1975年战败并撤离印度支那，再加上同时代的另外一些发展进程，似乎都在表明即将发生重大的转型。

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似乎在内部和外部都受到了威胁。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带领下，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很快便在20世纪80年代作出了保守的反应。柏林墙的倒塌(1989)和苏联的崩溃(1991)成了西方复苏达到顶点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对凯恩斯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反向革命。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扩大，代价是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下降。就前者而言，食利者(靠金融、知识产权等获利的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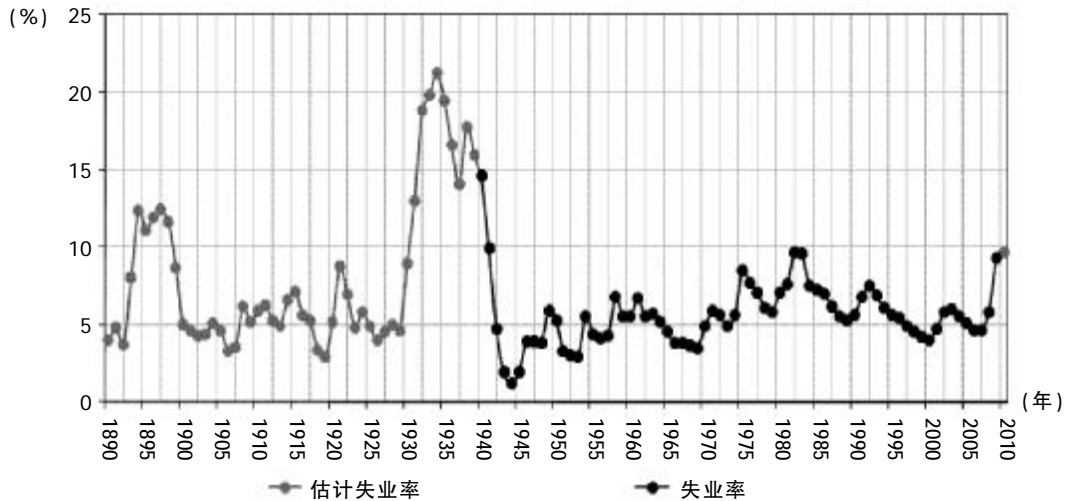


图7 美国失业率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1890—1930年的数据来自：Christina Romer (1986). Spurious Volatility in Historical Unemployment Data.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 1-37；1930—1940年的数据来自：Rober M. Coen (1973). Labor Force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 Re-Examination Based on Postwar Experi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5 (1): 46-55；1940—2011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S_Unemployment_1890-2009.gif)。

长,要比从事实体经济获得收入的人更快。尽管生产率提高了,但普遍存在的高失业和实际工资的停滞(如果说没有下降的话),导致了边际利润率的不断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会和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期。如此一来,撒切尔—里根的反向革命就在全球层面自动取得了成功。当前,资本主义已经仅仅是“城市里的表演”(show in town),而且人们主要争论的是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而非资本主义与某些系统性的替代方案。

金融部门还是实体部门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具有一些有别于以往经济危机的特征。人们不仅普遍将其视为近几十年来金融霸权导致的结果,而且还视为由政治和解、机构改革与企业反应导致的、不均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全

球化的特定产物。因此,尽管特定形势之下的环境决定了种种发展过程,但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或拯救美国国际集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并非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世界上的许多发展进程也决定着随后事态的变迁。例如,人们普遍坚信财政等刺激手段有助于克服2008年后期到2009年初的经济下滑。但到了2009年底,为了扭转这些反周期性的政策,财政紧缩的支持者在主权债务突然上升的情况下成功地唤醒了金融市场去拯救金融机构。近几十年来新的金融衍生品的扩张是相当独特的,可能对2008—2009年衰退的特性负有责任。截至2008年,总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金融债务和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360%)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甚至高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一个峰值。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的债务增长都发生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而非实体部门。尽管实体部门的债务占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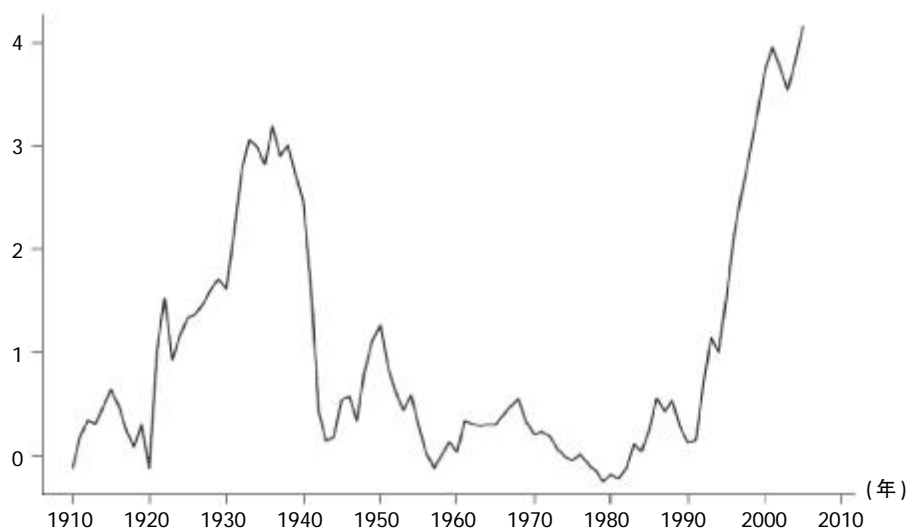


图8 美国金融部门的“过高”收入,以倍数计算(即其他行业平均工资收入的倍数)

资料来源:Thomas Philippon and Ariell Reshef (2008).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1909-2006. December. http://pages.stern.nyu.edu/~tphilipp/papers/pr_rev15.pdf.

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1962—2007 年间基本保持不变（约相当于年国内生产总值），但金融、保险与房地产部门的债务却增长了 4 倍，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400%。近些年来（在对教育、经历及其他一些通常的“决定因素”进行控制之后计算得出的）金融部门的相对报酬也异常高——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么高（图 8）。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还基本不存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正如马里奥·努蒂指出，当前的危机前所未有地起因于“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中介不受监管的退化，是 20 多年超级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根据总部位于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的数字，全球已发行的金融衍生品——对资产价值的赌注和对这些赌注的再赌注——呈指数增长，达到了 1140 万亿美元……与之相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才只有 60 万亿美元”（Nutti 2009）。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用来对冲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最后却成了动荡的根源。

在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有些金融机构走向破产，而另外一些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则获得了政府的救助。金融危机导致信贷枯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私人资本随之出现外流，由此给它们当中的许多国家带来不利影响并导致其经济放缓。然而，美国的“量化宽松”及其他类似的政策重新使短期资本流入许多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但鉴于这些政策有可能终止，这种资本流入已经出现反转，而且到 2013 年年中的时候，已经对这些接受资本流入的经济体产生了不利影响。

发展的制约因素

限制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的主要国际因素有两种类型。首先，制定和实施规则的法律

承诺，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签订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执行与贷款相关的政策条件和其他类似的协议等，是由各国政府作出的。其次，各国政府通常要遵从市场、商业媒体和舆论制造者等的制约和监督。经济学家、律师和其他市场专业人士的教育、培训、社会化和文化形态会发挥作用，塑造和定义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可接受的。

国际媒体也能起作用，制约中央银行、财政部或贸易部官员等决策者的行为。政策或决策既可能受到赞扬也可能遭到反对，致使官员们或者守住自己的名望，或者冒名声扫地的风险。挑战正统教条或“传统观点”会非常困难。例如，当马来西亚在 1998 年初实施资本管制的时候，国际金融媒体一致认为马来西亚前景堪忧。尽管资本管制已经姗姗来迟，但管制并没有产生如这些批评者所预测的有害后果。因此，媒体所有者，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向，都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

除了在法律上禁止或限制贸易保护和出口补贴之外，鉴于事实上存在着上述这些制约政策空间的因素，许多国家只好诉诸故意低估汇率来获得出口竞争力和实现出口导向型增长——这一政策方法后来也在学术论著当中获得某种支持（Dollar 1992; Easterly 1999; Polterovich and Popov 2004; Rodrik 2008）。这是一种通过出口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而产生的长期影响（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得到加强）（Polterovich and Popov 2004）。在发达国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普遍处于最佳水平，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通常还处于欠佳的水平，需要进行特殊的政策干预，以从来自出口的外部性当中获取收益。

尽管所有的外部性都被认为应该通过税收和补贴进行更好的管理，但选择性产

业政策工具通常需要一个相对廉洁和有效的官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利用这些推动增长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币值低估就相当于向所有贸易品征收进口税和为出口商提供补贴，从而增强出口的价格竞争力。作为一项非选择性产业政策工具，它甚至能够在高度腐败的环境当中得到成功运用。

储备的积累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储蓄多于投资，生产多于消费，如此一来，该国便可以用自己的储蓄为其他国家的投资与消费提供资金。然而，将储蓄放到国外投资似乎会降低本国的发展速度。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向穷国，因为发展中国家资本与劳动的收益比率较低，因此资本的回报率要更高。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效应，它完全可能被其他方面的效应所抵消。

另外一个效应具有动态性，且作用的

方向完全相反：如果一个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如较高的生产率、较低的工资或具有竞争力的汇率）而在世界市场上变得具有竞争力，那么其出口便会多于进口，并因此而获得贸易盈余。如果这一盈余被储存成外汇储备，便可以继续低估汇率和保持贸易盈余。这就是那些比其他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通常会有贸易盈余的原因（如 20 世纪初到 70 年代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以及最近几十年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储备的积累（被用来投资于可靠的政府短期证券，利率通常很低）意味着国民经济可能会遭受损失（Rodrik 2006），但这也被认为是推动出口导向型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储备积累可以视为“次优的”发展手段。

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储备积累与汇率低估政策的论点认为，如果所有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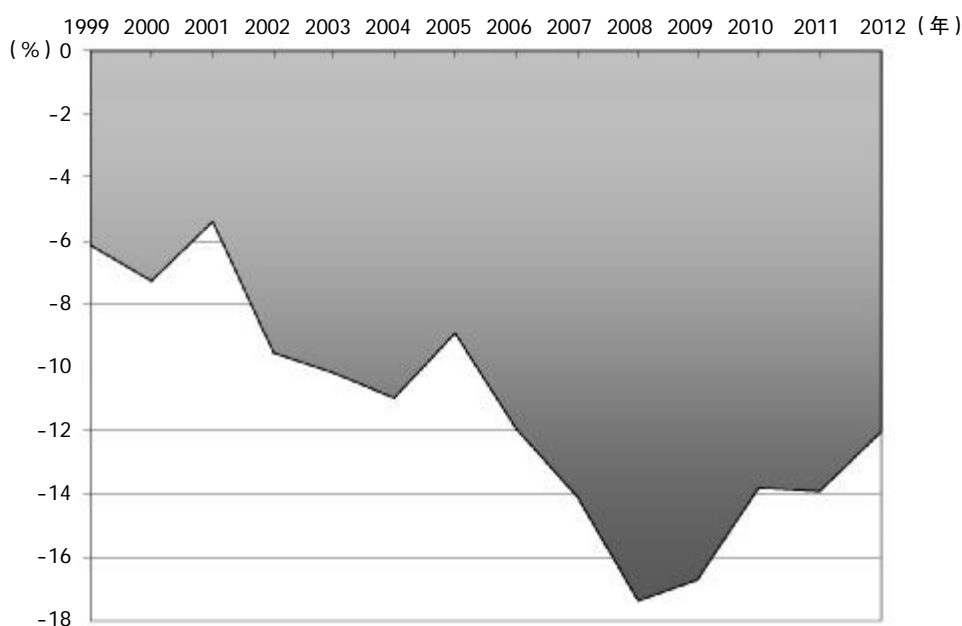


图 9 欧元区 17 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European Central Bank (http://sdw.ecb.europa.eu/quickview.do?SERIES_KEY=118.DD.Q.I6.BP_IIP_NT.PGDP.4F_N).

均采用这一政策，发达国家的债务将积累到不可持续的程度，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调整将会非常痛苦。然而，即使是在今天，大多数富国的债务水平并不是很高。美国的净外债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0%，欧元区的净国际债务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多一点(图 9)，而日本则仍是一个净债权国，其净国际资产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图 10, 表 1)。

当然，有些发达国家(包括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负债累累，但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则是净债权国(如德国和日本)或负债不多(如美国和英国)，具体可见表 1。因此，大多数西方国家(或者说北方国家)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借贷空间。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几乎没有为产业政策工具留下了什么政策空间，汇率低估就成了可被用来推动赶超式发展的几种工具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储备积累肯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随着它们实现赶超，这种积累可能会走到尽头。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可以

借机利用这些外国储备，做到消费多于产出，投资多于储蓄(Popov 2010)。

因此，维持世界上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助于缩小我们时代的重大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扩大了——地理因素而非阶级因素目前更能解释总体上的全球不平等(Milanovic 2012)。只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复兴，有迹象表明这一差距正在开始缩小。如果西方国家陷入债务，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有助于其更快发展的贸易盈余，那么尽快缩小这一差距的机会便会大很多。在此之前的 16—20 世纪，西方国家发展较快，在与“其他地方”的交往中积累了贸易盈余，然后又在“其他地方”深陷债务泥淖的时候，用这些盈余购买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如今拟议中作出的新安排，可以让“其他地方”得以在西方陷入债务的时候积累资产。

汇率保护主义只是可以用来刺激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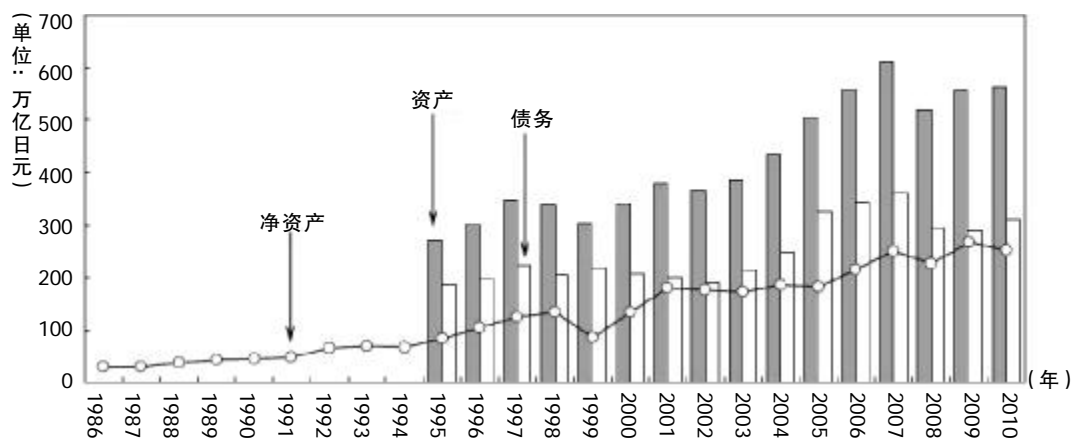


图 10 日本：国际资产与国际债务(以市场价值估算的直接投资)

注：1995—2010年的数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五版《国际收支手册》(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 计算得出，1986—1994年的数值则根据第四版《国际收支手册》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Japa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at Year-End 2010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Bank of Japan. BOJ Reports and Research papers, August 2011 (http://www.boj.or.jp/en/research/brp/ron_2011/data/ron110826a.pdf).

表 1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净国际资产 (单位: %)

国家(地区)/年份	净资产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香港(2010)	308.6
中国香港(2007)	233.6
日本(2010)	53.5
日本(2009)	56.5
日本(2008)	44.4
日本(2007)	48.5
瑞士(2010)	136.1
瑞士(2008)	123.2
中国(2009)	36.5
中国(2008)	34.5
德国(2010)	42.1
德国(2008)	26.2
俄罗斯(2009)	9.1
俄罗斯(2007)	-9.4
印度(2007)	-6.5
法国(2010)	-11.5
法国(2007)	13.4
英国(2010)	-13.2
英国(2008)	-4.6
加拿大(2010)	-16.2
加拿大(2008)	0.8
意大利(2010)	-17.1
意大利(2008)	-12.9
美国(2009)	-19.4
美国(2007)	-17.7
巴西(2007)	-38.8
澳大利亚(2010)	-58.2
西班牙(2010)	-87.1

注：负数为净欠债。

资料来源：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以及中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统计部门。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日本的数据来自其2008年底的国际投资头寸，日本银行国际部《日本银行报告和研究报告》（BOJ reports and research papers），2009年8月（https://www.boj.or.jp/en/research/brp/ron_2009/data/ron0908c.pdf）；Japa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at Year-End 2010.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日本银行国际部《日本银行报告和研究报告》（BOJ reports and research papers），2011年8月（http://www.boj.or.jp/en/research/brp/ron_2011/data/ron110826a.pdf）。

和促进赶超式发展的诸多产业政策工具之一。人们时常认为,在那些利用产业政策来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国家,进口替代会创造出“庞大且陈旧的工业体系”,这种体系只能在政府支持的保护主义围墙之内才能生存,一旦失去保护便会土崩瓦解。受保护的行业很容易会严重依赖贸易保护,并严格实行贸易保护,维护政府所提供的用来在特定部门或行业鼓励进口替代的其他激励措施。由此,寻租——作为对激励措施的反应,以及长期保持或不断增加这些措施的企图——就会很容易在其他经济部门落地生根并成为其长期的负担。

因此,即使不是迫使,也必须鼓励这种受保护的行业在合理的时间具备国际竞争力。“以促进出口为条件的有效保护”这一信条承认,对于工业化后发国家而言,进口替代对于推动工业发展通常是必要的,但必须以规模经济和改进质量快速具备出口竞争力。出口能够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规范相关行业,因为产品既必须在质量方面获得认同,又必须在成本和价格方面具有竞争力,尤其要想打入新的市场时更是如此。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确保政府部门或机构能够有效地监管和提升这些行业(Sundaram *et al.* 1997; Sundaram and Rock 1998; Sundaram 2001; Sundaram 2003)。

东亚“好的”产业政策——与之相对的是苏联、拉丁美洲和非洲“坏的”或糟糕的产业政策——的秘密,可能与东亚能够从出口外部性当中获益有关。向世界市场尤其是向发达国家出口,需要质量升级和满足更高的技术标准。对于特定的出口商而言,实现技术转型和加速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要大于经济效益。实际发展水平与一国出口的先进程度所反映的理想水平之间的差距,与生产率的增长率密切相关(Hausmann, Hwang and Rodrik 2006)。因

此,推动更先进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要比实际出口创汇具有更高的价值。并非所有试图推动这种出口的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那些没有这么做的国家,则永远没有机会加速推动产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和美国内战前的经济思想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毕竟,美国是现代时期第一个成功地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的国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负责为新独立的美国规划和设计主要的经济机构制度。因此,1776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年份,而且也因为它是美国革命开始的年份。

但是,美国直到内战之后才实现工业起飞。如果南方联邦获得胜利,废除奴隶制被推迟,美国仍将是农业为主的国家,或许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或阿根廷更相像。事实上,美国曾拒绝自由贸易,并通过各种制度性发展措施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这些措施无疑让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感到难堪。

针对未来的发展经济学

东亚制造的经济奇迹依靠的并非理论上对发展的思考,相反,它依靠的是实用的试验。东亚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和转型的过程中,从未受到正统或非正统的宏大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刻影响。相反,人们从中发现了一种深刻的实用主义,一种重新考虑已有思想的意愿,不管这些思想源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谨慎的试验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还意味着重点关注制约因素和瓶颈,以及解决和克服不可避免的障碍的意愿。

对于那种认为必须有强大的领导人或强有力政治人物的思想,人们必须保持谨慎。这很容易成为以发展来论证专制合理

性的藉口。毋宁说,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一种长期的观点,尤其是对发展的长期承诺,无论这种承诺是出于民族自豪感,还是仅仅为了保持现状或确保政权可以不通过单靠压制的方式而生存下去。大多数选举制度通常会鼓励政策的短期行为,因为快速见效对确保重新当选是必要的,或者说更糟糕的是,人们为了在政治环境允许和拥有可资利用的政治手段的时候尽可能地通过寻租获益。因此,机构制度改革挑战,在于加强对发展型治理的激励。这也正是应当重新就治理问题展开讨论并调整讨论方向的原因。

“发展经济学”这一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的崛起,已经产生了很复杂的后果。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而言,发展经济学是一种仿冒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打情骂俏,已经腐蚀和损害了抽象经济分析的优雅、严密和应有的优势地位。发展经济学紧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而至,它的崛起还激起了人们对据称这两种经济学都提倡的政府统制和干预国民经济的批评。当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遭到抛弃的时候,还发生了针对发展经济学的反向革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人都认为教授或学习发展经济学即便不是毫无必要,也是不明智的。在他们看来,真正需要的不过是将正统经济学永恒不变的法则运用于发展中经济体。

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向革命,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信奉“杂牌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式“新古典综合派”。但是,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并非重返也曾被认为不相干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而是返回实行一种由主张经济自由化、去管制、终止计划、扩大包括所谓知识产权在内的私人产权等各种经济学新时尚构成的大杂烩。如此一来,在促进竞争、消除经济寻租的名义之下,这种大杂烩原本与垄断对

立的论点却成了食利者扩大积累的依据。因此,举个例子,金融寻租已经远比凯恩斯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的时候严重得多,而知识产权近年来则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中所谓熊彼特式寻租的最重要依据。

因此,尽管重新考虑宏观经济生活的微观经济基础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思考主要是在虚构的世界之中进行的。同样,我们也需要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动态,尽管这些国家只是在模仿发达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毕竟,经济分析中的抽象化也包括模仿,并且将关注重点放在不进行分析就难以区分的经济关系和动态最为显著的方面。发展经济学最好的前景在于正统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之间批判性的互动。这不但需要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必要的更新,还要求经济学家普遍更加谦卑,在理解、洞悉和解决国家与全球层面上寡头垄断型市场经济的当代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时,就更是如此。

好的政策总是会根据具体情况而作出适当调整,对于不同类型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并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药方。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可能都会赞同这个大的原则,但在涉及特定政策的时候,他们却很难达成一致。就此而言,发展经济学应该有助于解释——尤其是在发展的语境之下——为何某些特定的政策(如关税保护主义、储备积累、控制资本流动、将特定企业国有化,等等)比另外一些政策更有优势。

政策制定的艺术还包括懂得应该在什么时候改变政策,以避免落入发展的陷阱。从不同的经验当中汇集教训,或许能揭示增长要素之间的互动、排序与层级。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合适的制度框架,如更加有效地动员国内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防止汇率高估,以此来发挥某种战略性作用。因

此，成功的增长战略——就东亚诸龙而言——似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 建设强有力的、能够提供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法律和秩序、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等)的国家机构；
- 动员国内储蓄,以扩大投资；
- 实行渐进性改革,扩大市场激励机制；
- 产业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出口激励、汇率低估等工具；
- 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应确保中期至长期的宏观经济平衡。这意味着需要持续连贯地采取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非采取在近年来已经成为规范的所谓市场友好型顺周期性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还应当是有利于发展的,如通过快速积累外汇储备的汇率低估政策。

对于那些试图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家而言,对发达国家来说好的东西不一定对自己也是好的。在贸易政策、产业组织和汇率管理等诸多领域,彻底取消管制和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已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危害。在知识产权保护、控制移民等其他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经合组织成员国所向往的那种国家干预(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对非熟练工人流动的限制)。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如果没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或至少获得它们的默许,那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好政策”——无论是发展型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法单方面实施的。因此,采取更加有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新游戏规则,或许会最终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增长并使全球化“为穷人谋利”。

但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合适的发展战略、与北方国家磋商以求在世界经济中获

得更友好发展条件的能力,可能会被这些国家内部的一些变化情况尤其是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所破坏。这种不平等与各种负面的社会后果,如犯罪率上升、死亡率居高不下、肥胖、心理疾患、受教育程度低下等密切相关(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不平等通常会阻碍社会流动性和加深社会文化鸿沟:不平等程度越高,人们的收入就越有可能与其父母的收入相近(“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如此一来,社会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治结构,也会变得非常僵化。

经常有人宣称不平等促进积累与增长,但历史上并没有多少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相反,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通常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相关,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则总是被用来通过寻租和保持租金等明显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来扩大收入差距。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07)

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观察到的那样:“广泛不平等的社会难以有效率地运转,从长期来看,它们的经济既无法保持稳定,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当最富人利用其政治权力为其所掌控的企业过度牟取利益的时候,大量急需的收入便被转到了少数人的腰包,而不是让广大社会受益……在控制其他所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高度不平等与低速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不平等水平最高的地区,拉美国家的经历预示着未来的图景。许多国家曾几十年深陷国内冲突的泥淖,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根本就没有社会凝聚力”(Stiglitz 2012)。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就会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机构制度效率差、低速增长、社会流动性差,

以及社会高度紧张。

代结论

最近的危机有助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引起了右派的强烈反应,他们将凯恩斯主义描述为社会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张进行反周期的国家干预。尽管人们可能对回到苏联的状态没有什么兴趣,但当前的危机,以及逐渐认识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及其他社会问题,已经使人们普遍再次对经济的替代方案产生了兴趣,其中包括那些经常在广义上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方案。然而,西方社会似乎并没有大声疾呼要对经济与社会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通过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以及后来的马歇尔计划等导致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正在发生一次深刻变革。萨缪尔·阿明曾在2010年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束,还是资本主义的结束?”(Amin 2010)。从当前来看,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是“二者都没有结束”。

例如,在最近的危机之后,迄今为止金融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监管——不仅在国际上如此,甚至在许多国家经济体系内部也是如此。毋庸置疑,人们仍然没有将实体经济的利益放在金融领域的利益之前。尽管近几十年来不平等一直在加大,但并没有人提出扭转这一趋势的重大方案。而且也几乎没有真正作出什么努力来确保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继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通过大量举债来拯救金融体系,大大增加了主权债务。这在接下来导致了政府开支的削减,尤其是减少财政刺激,以求在

表面上维持信用等级和安抚债券市场。在欧元区国家及其他处于相同境地的经济体,政府无法通过“印制钞票”来借贷。通过上述和其他方式,许多以前可供主权政府利用的政策工具已经无法再继续使用。事实上,各国政府不得不依赖于私人金融市场,甚至已经变成这一市场的人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罗斯福,也不会有催生马歇尔计划等倡议的冷战。

大多数曾一度接受低度不平等发展模式的另类选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程度正在急剧上升。许多以前采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发展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开启了以市场和私营部门为导向的改革,即实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缩减政府规模,这将带来可以预见到的不平等后果。

此外,并非所有国家经济统制或政府干预都是发展型的。这种统制和干预很容易便会成为领导人或决策者牟取私利的工具。而且,当他们并不打算长期执政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动力去做长期打算或去推动发展。与此同时,以前迫使政府作长远考虑的约束和制衡因素也遭到了削弱。

有些政府并没有感觉它们需要限制失业率,相反,它们希望依靠市场机制,通过降低工资来降低失业率;根据这一逻辑,低工资将增加利润和扩大投资,并因此最终创造新的就业。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扩张政策也寻求以失业率、产出和生产能力等方面尽可能小的暂时性倒退,通过反周期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但凯恩斯主义实现充分就业的“软”的方式并不一定能恢复利润率。因此,将压力放在失业劳动力身上只是一种偏好。

不足为奇的是,在过去30年间,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大多数国家——西方国家、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在最近 30 年里都呈上升之势。19 世纪的不平等程度(见图 3)要比工业革命之前高很多 (Milanovic,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07)。在西方国家工人运动兴起和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 19 世纪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被扭转, 因为共产主义传播的威胁给福利主义的再分配改革带来了启示, 给了资本主义一副比较人道

的面孔。这种约束和制衡在最近几十年被大大削弱,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十年里 (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过去十年来) 的经济表现有了改进, 终于已经促进了穷国与富国之间收入的某种趋同。

[沈晓雷译]

注 释

1. 如果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确实存在, 那么这一次长周期中的最低点应该是在 21 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

而非现在; 此前的低谷期分别为 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 以及 20 世纪 70—80 年代。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LVAREDO, F., ATKINSON, A.B., PIKETTY, T. and SAEZ, E. 2012.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25 April. <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 AMIN, S. 2010.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Oxford: Pambazuka Press.
- COEN, R.M. 1973. "Labor Force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 Re-Examination Based on Postwar Experi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5 (1): 46 - 55.
- BEZEMER, D. and HUDSON, M. 2012. "Incorporating the Rentier Sectors into a Financial Model." *World Economic Review* 1: 1-12.
- DOLLAR, D. 1992. "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 1976-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0 (3), April: 523-544.
- EASTERLY, W. 1999. "The Lost Decades: Explain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1980-199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EICHENGREEN, B. and O'ROURKE, K.H.. "A Tale of Two Depressions." 6 April 2009. <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3421>.
- HAUSMANN, R., HWANG, J. and RODRIK, D. 2006.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NBER Working Paper, January 2006.
- LEONTIEF, W. 1974. "Sails and Rudders, Ship of State." In *Capitalism, the Moving Target*, edited by L. Silk.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pp. 101-104.
- MADDISON, A. 2010.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 - 2008 AD." OECD, Paris.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 MILANOVIĆ, B., LINDERT, P. and WILLIAMSON, J.G. 2007. "Measuring Ancient Inequali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PS 4412. (Published as: "Pre-Industrial Ine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21, March 2010: 255 – 272).
- MILANOVIĆ, B. 2009. "Global Inequality Recalculated: The Effect of New 2005 PPP Estimates on Global Inequality." MPRA Paper No. 16538,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 NUTI, M. 2009. "Bucket and Spoon." Transition. April 15, 2009 <http://dmarionuti.blogspot.com/2009/04/bucket-and-spoon.html>.
- PHILIPPON, T. and A. RESHEF. 2008.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1909–2006." December. http://pages.stern.nyu.edu/~tphilipp/paper/s/pr_rev15.pdf.
- POLTEROVICH, V. and POPOV, V. 2004. "Accumul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In *Slavic Eura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edited by S. Tabata and A. Iwashita.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 2004. <http://www.nes.ru/%7Evpopov/docum>ents/EXCHANGE%20RATE-GrowthDEC2002withcharts.pdf.
- POPOV, V. 2010. "Global Imbalances: An Unconventional View." - CEFIR and NES Working Paper #160. May 2010.
- POPOV, V. 2012. "Russia: Austerity and Deficit Reduc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6 (January): 313 – 334.
- RODRIG, D. 2006a. "The Social Cos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0 (3), September: 253–266.
- RODRIG, D. 2006b.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 RODRIG, D. 2008.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8: 2.23.
- ROMER, C. 1986. "Spurious Volatility in Historical Unemployment Data."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 1 – 37.: 1940 – 2011 data from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S_Unemployment_1890-2009.gif.
- STIGLITZ, J.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 pp. 83–84, 117.
- SUNDARAM, J.K. et al. 1997. *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Boulder, CO: Westview.
- SUNDARAM, J. K. and ROCK, M. 1998.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Primary Commodity Processing in the Second-tier South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UNCTAD Discussion Paper No. 136, Geneva.
- SUNDARAM, J. K. (ed.) 2001. *Southeast Asia's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Policy, Capabilities and Sustainability*. Palgrave, Basingstoke.
- SUNDARAM, J. K. (ed.) 2003.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How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National Firms and Industries Developed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WILKINSON, R. and PICKETT, K. 2010.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责任编辑:梁光严)